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CHINA EDUCATIO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发展报告(2026)

中国高等教育

国际合作与交流发展报告（2026）

本报告从宏观背景、发展趋势、发展模式、面临挑战和行动倡议五个方面来阐述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整体格局和演变特征。

www.ceaie.edu.cn

序言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的复杂博弈，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加速演进，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地位与角色的变化，共同构成了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宏观背景。传统上以人员流动为核心的国际化模式面临挑战，而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显又使得国际交流合作的需求空前迫切。中国高校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价值理念、功能定位、合作格局与发展路径正发生深层次转变，更加注重制度创新、能力建设、多边协同与全球参与。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作为专门从事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社会团体和行业组织，在“政府助手、政社桥梁、行业引领”的定位指引下，聚力加强专业能力建设和工作行业引领性，充分结合协会在组织、协调、规范和引领我国非官方教育国际交流的实践经验，联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共同撰写《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发展报告（2026）》。本报告梳理当前全球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发展范式，总结提炼中国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发展趋势和国际化办学模式，分析当前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发出推动更加开放、优质、互惠和可持续的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倡议。

本报告基于最近十年宏观数据统计、国内外教育政策文本、相关学术文献、高校领导及专家访谈，采取分区域分类型实地调研等方式，力求保障研究报告数据的时效性、可靠性、客观性和系统性。本报告可为政府及相关机构决策、中外高校推动高质量国际交流合作提供有益参考，也诚邀未来有更多院校和机构主动加入本系列调研，共同绘就全球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图景。

目录

一　宏观背景：全球新格局重构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发展范式　01

二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八大趋势　02

趋势一：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网络向多极化与区域联动拓展　02
趋势二：双向人员流动促进全球人才培养与高层次人才集聚　03
趋势三：中外合作办学功能定位趋向多元与转型升级　04
趋势四：在地国际化开辟国际化人才自主培养新路径　05
趋势五：中国高校在国际科研合作中的主动性与开放性逐步增强　05
趋势六：数字技术丰富拓展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形态　06
趋势七：中国高校“走出去”形式日趋灵活、多元　07
趋势八：国际组织和国际联盟成为高校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媒介　08

三　中国高校国际化发展的四类模式　09

模式一：全面国际化模式　09
模式二：特色化 / 项目化发展模式　10
模式三：中外合作办学模式　10
模式四：国际校区或特区模式　11

四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高质量转型发展面临的挑战　12

（一）对国际化价值理念的理解存在多重张力　12
（二）“引进来”与“走出去”的质量效益不均衡　12
（三）国际化治理与专业服务能力有待提升　13

五　行动倡议：推动更加开放、优质、互惠和可持续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　14

行动倡议一：共同维护开放、互信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空间　14
行动倡议二：共同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内涵式、普惠化发展　15
行动倡议三：共同加快跨境学习、科研合作和数字教育的联通　15
行动倡议四：共同提升各类教育主体作用与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16

一 宏观背景：全球新格局重构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发展范式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深度嵌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科技革命、文明交流互鉴和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之中。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外部环境和实践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从外部环境看，近年来，支撑高等教育开放合作的政治经济环境与制度条件正在发生显著变化。政治与安全因素对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影响日益突出，部分国家不断强化经济安全、科研安全、关键技术竞争、跨境数据流动和知识产权保护，签证管理、出口管制和合作审查趋严。世界高等教育呈现多极化、区域化发展特征，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运行逻辑正在发生改变。[1] 面对新形势，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需要统筹开放与安全、合作与竞争、引进与输出之间的关系，在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的同时增强开放体系的韧性。为此，更需要着力提升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质量，优化国际合作布局，增强风险识别与治理能力，在不确定性攀升的国际环境中把握高等教育开放的主动权。

就实践方式而言，随着数字教育平台的迅速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正进入实体流动与虚拟流动并存的新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创新要素流动带来的学习成本，扩大了参与国际交流合作的受益面，但数字资源的配置仍受到技术能力、平台规则、语言优势、数据治理和质量认证的影响。中国亟需把握数字化转型机遇，加强相关领域的制度建设，推动国内相关制度与国际规则有效衔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全球共享，增强参与全球数字教育平台建设与规则制定的能力。

同时，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关乎制度和资源的开放，也涉及知识体系和文明的互动与共享。高等教育国际化必须超越简单的指标化和项目化，构建起多元知识体系之间的平等对话机制。中国需要在吸收世界一流教育资源的同时，提升其在全球知识生产、教育规则协商、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主体性，在开放中建设自主知识体系，在合作中提升国际话语能力，在交流中促进文明互鉴，推动中国经验和教育思想进入世界知识体系，在世界高等教育变革中贡献中国经验。

二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八大趋势

伴随国际秩序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与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重塑，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正逐步由人员往来、项目合作和资源引进，迈向以规范建构、标准协同与制度型开放为重要特征的新阶段。中国高校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价值理念、功能定位、合作格局与发展路径均发生深层次转变，更加注重制度创新、能力建设、多边协同与全球参与，并呈现如下发展趋势：

趋势一：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网络向多极化与区域联动拓展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网络逐步呈现出开放性、平台化与多元化特征，在巩固与欧美发达国家合作的同时，加速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全球南方拓展，形成多极支撑、区域联动的布局。近年来，中国高校继续保持与欧美国家和世界学术前沿的交流合作，通过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联合培养和联合科研，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能级和科研水平；通过举办中法教育发展论坛、中意大学校长对话会、中欧卓越大学校长对话会、中美 STEM 教育协同发展对话等，打造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多双边机制平台和品牌交流活动，集聚世界一流资源与创新要素，实现从单一人员交流到以项目平台为支撑、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为重点的高等教育合作范式。[2]

同时，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网络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中国—东盟、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加速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拓展。在人工智能、工程科技、数字教育等重点领域，中国高校依托“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区域性大学联盟，与全球南方高校建立了更加广泛、稳定的合作网络。中国—中亚产教融合联盟、中国—东盟数字教育联盟、中国—东盟工科大学联盟多边机制也不断发展，中国—中亚教育交流合作中心、中国—上合组织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及博士生培养创新中心等合作平台相继落地，推动区域内高校在课程资源共享、师生流动、联合科研等方面深化合作。

中国不同地区高校结合自身办学定位与地缘优势，形成了多元化、差异化合作格局：东南沿海高校持续深化与港澳台地区的交流合作；中西部高校推进丝路沿线的教育合作交流；西北、东北地区高校主要面向中亚、俄罗斯等方向拓展合作空间，西南地区高校则成为与东盟开展合作的重要窗口。[3] 国际合作网络的区域联动特征更加明显。

趋势二：
双向人员流动促进全球人才培养与高层次人才集聚

随着世界高等教育格局日趋多极化，跨国人才流动呈现出开放式流动的特征，人才回流和环流趋势不断加强。[4] 目前，中国既是全球主要的留学生来源国，也成为国际学生和高层次人才的重要流入地。

出国留学方面，2025 年度，中国共有 57.06 万出国留学人员。近三年，出国留学人员规模总体平稳。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新加坡、俄罗斯、西班牙、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仍是受留学人员欢迎的留学目的地国。中国出国留学人员结构持续优化，出国留学人员以攻读硕士及以上学历为主，高层次留学人员规模持续上升。

留学回国方面，2025 年度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 53.56 万人，由于国家综合实力增强，经济发展空间广阔，科技创新日新月异，人才政策吸引力不断上升，中国出国留学人员回流呈稳步增长态势，2025 年度中国出国与回国人数比例达到 1.07：1。

另一方面，来华留学呈现出规模恢复、结构调整与质量提升的发展态势。2025 年中国境内来华留学生总数超过 38 万人，来源覆盖了 190 余个国家和地区，分布在 30 个省（区、市）的 1100 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育机构。就生源地结构而言，亚洲学生长期占来华留学生数量的六成左右，东盟等周边地区国家是主要来源地。从培养层次看，学历教育规模占比不断扩大，其中研究生占比超过 35%。与此同时，全球赴华短期交流与学习需求较为旺盛，为涵养优质来华留学生源提供了新空间。随着全球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快速变化，国际学生选择留学目的地时更加重视雇主认可度、就业前景等，[5] 中国高校正着力以需求导向的专业匹配、标准引领的培养质量和全球适配的职业发展预期为支撑，实现来华留学高质量发展。

高技能人才流动同样呈现明显的双向和循环特征。随着外籍人才在华工作、居留政策的不断完善，高校吸引国际教师的能力持续增强。与此同时，中国科研人员海外学习和工作后的回流趋势不断增强。随着国内科研条件和创新环境的优化，海归科学家的科研表现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学术网络中的影响力显著增强，由此形成的网络位势差进一步促进了国际人才流入与人才回流。[6] 在更加广泛、开放的双向人员流动格局下，中国正加快形成全球卓越人才集聚的重要枢纽。

趋势三：
中外合作办学功能定位趋向多元与转型升级

中外合作办学正在通过层次提升、结构优化、制度创新和功能拓展等方式实现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从办学层次看，本科教育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占据主体地位。截至 2026 年 10 月，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超过 1700 个，占全部合作办学的 69%。其中，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机构 11 所、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400 多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1300 多个，另有依据《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办学暂行规定》批准设立的境外高校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独立办学的大学 2 所。从发展趋势来看，本科以上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总体呈现增加态势。

中外合作办学格局也日趋多元化。在以欧美国家为合作主体的同时，中国高校日益加强与新兴经济体高校的合作关系，合作伙伴向全球范围扩展，[7] 形成了多样化、广覆盖的中外合作办学空间格局。从学科结构看，2020—2025 年新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专业布局持续调整，理工类专业不断扩张，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设置更加侧重前沿技术和交叉领域。[8]

中外合作办学作为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制度载体，其运行逻辑、功能定位正在发生深刻转型。早期合作办学主要承担引进国外优质课程、师资与培养模式的功能，随着办学实践不断积累，其作用也逐渐向推动教育改革、服务国家创新体系延伸。[9] 中外合作办学致力于在人才培养、科研组织与学术评价机制等方面实现制度创新，从而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形成结构性支撑。[10] 部分高校通过合作办学整合多所高校的课程、师资和培养资源，突破传统“一对一”合作模式，为学生提供更加灵活、低成本的跨国学习路径。部分高校还将合作办学中形成的课程建设、质量保障与人才培养经验向校内其他院系推广，推动国际一流教育资源在本土调适基础上，进一步转化为学校整体的国际化办学能力。此外，反向“合作办学”逐步兴起，中国高校的课程体系、培养模式进入境外合作办学机构，有助于提升来华留学生学业准备度和整体生源质量。中外合作办学在国际科教网络构建、高水平科研平台建设、人才培养范式变革等维度的创新实践显示，其在科技创新、产教融合以及科教融汇中发挥着独特优势与价值。[11]

趋势四：
在地国际化开辟国际化人才自主培养新路径

在地国际化是指高校充分利用国际教师、留学生、跨境项目、国际课程与国际会议等既有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建设具有本土特色的国际性校园，进而实现培养高层次国际化人才的办学目标。[12] 随着国际化人才培养由依赖跨境流动逐步转向整合校本国际化培养资源，在地国际化正成为扩大国际化教育覆盖面、提升国际化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的重要路径。

从资源基础看，中国高校推进在地国际化主要依托四类资源，即国际师生资源、课程资源、数字基础设施、国际交流平台。首先，高校通过多种组织形式主动将外籍教师、国际学生和具有海外经历的教师嵌入日常教学、校园生活，促进跨文化互动成为常态化学习体验。其次，国际化课程体系建设日益受到重视。通过国际化课程学分、国际小学期、国际化课程开发等制度安排，越来越多高校正将国际性与跨文化维度融入人才培养方案。

再次，数字技术进一步拓展在地国际化的资源边界。高校广泛引入 Canvas 和 MOOCs 等国际数字教学平台，持续扩大在线国际合作学习（COIL）规模，为学生创造在本土校园接触国际化事物与跨文化场景的机会。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人工智能 +”综合改革的推进，人工智能也有望进一步赋能本土国际化人才培养。此外，越来越多高校开始主动发起国际青年对话、全球议题论坛等活动，将国际交流资源引入本土校园，组织中外学生开展深度交流，使本土校园成为国际理解、文明互鉴与全球胜任力培养的重要场域。

趋势五：
中国高校在国际科研合作中的主动性与开放性逐步增强

中国通过国家科学体系与全球科学体系之间的有效协同，持续提升在国际科技和高等教育格局中的地位与影响力。[13] 整体而言，中国高校的国际科研合作规模持续扩大，合作网络呈现多边化与去中心化特征。[14]

随着大科学时代科学问题的范围、规模与复杂性持续增长，中国高校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的深度与广度也在不断拓展，主动发起大科学项目的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目前牵头发起深时数字地球（DDE）、海洋负排放（ONCE）、人体蛋白质组导航（π-HuB）等国际大科学计划，并积极参与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等大科学计划，将自身科研优势转化为全球科学体系的发展动能。

在合作议题上，重视聚焦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生命健康等关乎人类福祉的全球性公共议题。同时注重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侧重破解区域发展瓶颈的技术落地，并伴随技术标准、人才培养以及基础设施的整体输出，贡献了中国智慧。

趋势六：
数字技术丰富拓展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形态

数字技术正在重塑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形态和边界。随着在线平台、人工智能、数字认证等技术加快进入教学与治理场景，国际化活动逐步突破人员跨境流动的时空限制，“虚拟国际化”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新范式。[15]

得益于国家对数字基础设施的大力投入，在线教育迅速融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高校对数字课程资源的供给能力持续增强。截至 2024 年，中国上线慕课超过 9.7 万门，慕课数量和学习人数均居世界第一位。[16] 依托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中国高校持续推进“慕课出海”行动，并在汉语与中华文化等在线非学历项目中形成国际吸引力。[17] 在此基础上，中国高校正着力扩大在线学历项目供给，升级项目结构，使其由课程资源共享向体系化人才培养延伸。

与此同时，中国高等教育的数字化国际合作更加注重教育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依托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世界数字教育联盟等机制，中国高校积极发起数字教育合作倡议、分享数字教育治理经验。《教育大模型总体参考框架》等成果的形成，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化国际合作进一步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规范与治理机制拓展，[18] 为全球数字教育治理体系提供标准支撑。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跨境学习的组织与认证方式也在不断创新，高等教育中的微证书、微专业等模块化学习形态加快与数字教育融合。中国顶尖高校正持续推出全球融合式证书项目，探索将在线国际合作学习（COIL）、学分转移与互认和跨学科人才培养相结合。随着微证书体系和学分互认机制不断完善，数字技术有望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由“课程跨境流动”进一步向“学习成果跨境流动”扩展，并为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新的实现路径。

趋势七：
中国高校“走出去”形式日趋灵活、多元

教育对外开放迈入“引进来”与“走出去”相互支撑、协同推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高校“走出去”的方式更加灵活、多元。境外办学作为教育出海最具深度的形式，正处于稳步推进阶段。截至 2026 年，中国高校已在海外设立二十余所办学机构，主要分布于东亚、东南亚、中亚以及中欧、南欧等地区。近 5 年非“双一流”高校和中西部高校表现突出，显示出特色化、差异化教育出海路径的潜力。

非学历教育出海形式也日趋灵活。课程、语言、培训与学历衔接等轻量化出海模式广泛涌现并相互融合，轻资产、平台化以及与企业需求结合的出海形式蓬勃发展。中国在工程、科技、职业教育等领域的比较优势，正逐渐转化为面向全球的教育方案与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中国高校牵头的“卓越工程师”培养项目走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依托“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这一多边平台，中国正在加快发起 STEM 教师教育倡议，分享中国 STEM 教育领域融合科技、人文与生态责任的理念与规范。中国高校积极推动“海外科技小院”在东南亚、中亚、非洲等全球南方国家落地，为其能力建设和全球减贫作出重要贡献。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强孔子学院建设。“中文 + 职业技能”订单式人才培养兴起，部分孔子学院正由单一语言机构转向服务区域合作、企业出海与技能培训的复合型平台。高等职业院校积极探索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海外工程（应用）技术学院，推动建设鲁班工坊等多模式、多品牌海外办学项目，中国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被纳入多个合作国国民教育体系。此外，中国牵头制定的世界职业教育标准框架《北京协议》正式发布，中国标准开始在全球职业教育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

趋势八：
国际组织和国际联盟成为高校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媒介

全球教育治理是推动全球教育变革的重要制度保障。伴随国际秩序的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也进入体系调整和机制创新的窗口期。[19] 中国高等教育正由知识枢纽向全球治理枢纽转型，[20] 并通过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等平台，更深度地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规范建构和规则协商。

中国高校积极培养和输送国际组织人才，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国际组织实习计划、全球胜任力培养计划日渐嵌入中国高校的人才培养体系。研究型高校、应用型高校依托学科优势与行业定位培养专业人才，形成各具特色的培养路径，如政法类、外语类、海洋类高校分别聚焦涉外法治、多语种复合与涉海国际事务人才。[21] 中国高校还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中心、教师教育中心等二类机构建设，围绕数字化转型、教师专业发展等议题，有力推进全球南方国家的能力建设。2025 年“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作为一类机构正式落户上海，成为推动中国建设世界教育中心、塑造全球教育规则共建者身份的新平台。[22]

此外，中国高校通过牵头发起或参与国际联盟，不断拓展合作网络、提升国际话语权，涵盖外语外事、农业科技、海事技术等诸多领域。依托区域禀赋与学科特色，中国高校逐步由国际合作网络的参与者向组织者转变，并通过联盟平台推动知识共享、专业合作与标准协同，进一步将国际合作拓展为相关领域的制度性成果。

三 中国高校
国际化发展的四类模式

中国高校在长期国际交流与合作实践中形成了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基于其发展的动力机制与资源配置情况，大致可分为四种模式：全面国际化模式、特色化与项目化发展模式、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国际校区（特区）模式。

总体来看，部分开放程度较高地区的研究型大学正在探索全面国际化发展模式；多数高校则立足优势学科和重点领域，采取更加灵活多元的特色化与项目化发展路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已形成多层次、多形态并存的发展格局；国际校区或特区模式作为一种以增量发展为主的新型高校国际化发展类型，目前仅有少数具备国际化办学基础、较强资源整合能力的高校在实践探索。

模式一：全面国际化模式

全面国际化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将国际化提升为学校整体发展的战略与目标使命，深度嵌入发展规划、治理体系与资源配置的全链条，融入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全过程。采取这一模式的高校大多位于开放程度较高、创新要素汇聚、高等教育与科技资源集聚的区域。这类高校已经建立较为完整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政策措施及制度体系。首先，国际化目标被纳入学校中长期发展规划与顶层设计，形成较为清晰的发展愿景，并获得相对稳定的经费和资源保障。其次，学校层面的统筹协调能力较强，国际化职能部门与教务、科研、人事、学生工作等部门之间协同良好，并通过专项工作机制推动二级学院共同参与。同时，国际化资源深度融入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体系。通过书院等组织载体推进中外学生趋同化管理，为不同背景学生的跨文化交流、共同学习与生活提供制度空间；将资格互认、学分互换等制度安排纳入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扩大国际化学习机会的覆盖面，使国际化学习逐步成为人才培养的常态化组成部分。此外，学校在国际人才引进和国际科研合作方面制定了良好的政策措施，提供资源保障；建立了相对成熟的国际化工作评估与考核体系，形成了国际化工作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格局。

模式二：
特色化 / 项目化发展模式

特色化、项目化发展是中国高校国际化发展较为普遍的一种模式。这类高校更多基于自身学科优势、办学定位以及资源条件，将有限资源集中配置于重点领域、重点维度和重点项目，通过形成具有辨识度的合作载体实现局部突破，体现特色化、项目化发展特点。具体而言，主要呈现出四种实践路径。第一，以特色项目增强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推动来华留学教育的内涵式发展。部分高校通过国际联合培养、多学位项目等创新性设计，整合优质国际教育资源，提升来华留学的质量水平。第二，以优势学科牵引国际合作网络与联盟建设。部分高校依托自身优势学科积极发起国际学术联盟，推动合作由人员交流、学术会议等相对松散的联系，逐步向国际联合研究、人才培养拓展，从而提升了学校在特定专业领域的国际能见度与影响力。第三，借助行业优势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建设。行业特色高校主动对接相关国际组织与专业网络，通过提案研究、技术标准开发等方式，提升自身参与全球行业治理的能力，推动国际合作由人员和项目交流进一步延伸至规则与标准制定层面。第四，借助高校品牌优势和海外合作网络，走出去办学。通过设立海外办学实体、教学点，以及共建合作基地、中心、平台等方式，拓展境外办学与国际合作。

模式三：
中外合作办学模式

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以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不具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为主要载体，通过持续吸纳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办学模式和治理经验，带动高校整体国际化办学能力提升。从发展过程看，这一模式呈现出由资源引进向本土转化、再向制度创新逐步深化的特征。首先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系统吸纳。中国高校通过合作办学，引进国外高校较为成熟的课程框架、教材体系、学术标准和质量保障机制，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外部参照。其次是国际资源的本土调适与转化。随着合作的深入，引进资源逐步与本土产业发展需求、中国学生学习特征相结合，高校对课程内容、教学方式进行适应性调整，使国际教育资源真正嵌入本土人才培养体系，并服务于人才自主培养。再次是由要素流动激发制度创新。伴随课程、师资、管理经验的持续跨境流动，中外双方在教学组织、质量评价、学术治理等方面不断形成新的协同机制，推动合作办学升级为制度创新与能力建设平台。概言之，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转化与张力。国际资源只有经过有效的本土转化，才能形成稳定的办学能力，而本土实践也可持续推动合作办学的内生发展。

模式四：国际校区或特区模式

国际校区或特区模式，是指高校在本地或者异地建设相对独立、功能综合的国际化办学校区，通过相对集中的制度安排和资源配置，开展国际化人才培养、科研合作与办学机制创新。这类模式具有更鲜明的空间集聚和制度试验特征。在资源组织方式上，国际校区模式由中国高校主导办学定位，同时引入国外高水平大学的课程、师资、科研平台等，通过自主配置、整合国际优质教育资源，探索融合不同教育体系优势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科研创新模式。与此同时，国际校区通常与地方产业和社会需求保持紧密联系，围绕区域重点产业和前沿交叉领域，布局科技园和产业园，推动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资源开放和协同创新，形成了国际化要素集聚平台。随着相关机制逐步成熟，国际校区还可发挥制度创新的扩散作用，将国际化办学经验向主校区转移，通过增量创新反哺存量改革，推动高校整体国际化发展提质增效。

四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高质量转型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对国际化价值理念的理解存在多重张力

高校尚需提升对教育国际化内涵的理解，国际化本质上是人才培养理念、知识体系、教育方式以及校园文化的系统变革，而不仅是留学生数量、合作项目规模、外籍教师比例、国际排名等量化指标上的显示度。各类国际化资源的引入，不会自然转化为学生跨文化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关键在于建立课程教学、实践体验、能力培养与学习评价之间的有效衔接。因此，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价值理念必须由“流动中心”转向“育人为本”，实现从“融入世界”到“贡献世界”、从“跟跑借鉴”到“并跑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在开放与安全、国际标准与中国特色、引进吸收与自主创新方面，尚需进一步形成成熟稳定、能够有效指导实践的理念与价值观念。需要进一步协调开放与安全的关系；进一步厘清中国特色与国际标准的关系，国际化既要积极对接国际通行规则、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也要立足于中国教育规律、文化传统以及价值立场；进一步把握引进吸收与自主创新的关系，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创新要素的引进，应成为推动本土实践和激发制度创新的重要过程。

（二）“引进来”与“走出去”的质量效益不均衡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在规模上有显著提升，但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资源投入与实际效益、“引进来”与“走出去”之间缺乏均衡发展，双向开放在能力建设、质量效益等方面尚未形成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长期以“引进来”为重要发展路径，进入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新阶段，不仅需要提升对世界一流教育资源的引进能力，更应注重对国际要素的有效利用与本土化再造。优质境外教育资源的引进尚需进一步加强，高水平、深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比重有待提升，资源引进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本土产业人才需求的结合需进一步深化。针对国际规则、规制、标准的引进与衔接不足，应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制度型对外开放水平。

相较于“引进来”，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走出去”起步较晚，规模质量效益亟待提升。境外办学处于由规模布局向质量提升转型的初级阶段，办学深度、能力建设和持续发展机制尚不完善，缺乏系统政策与制度指引、质量评估与保障机制，中国高等教育技术、标准、规则、规制和管理的向外传播和输出还处于探索发展阶段。

（三）国际化治理与专业服务能力有待提升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对统筹开放与安全、提升质量与效益、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提出更高要求，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仍存在短板。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教育、科技、外交、人才、产业、文化、安全等多个领域，需要多部门之间进行统筹协调、信息共享和政策衔接，形成权责清晰的协同治理体系。高水平国际合作与交流所必需的签证与居留、学历学位互认、税收、就业许可、外籍人员服务管理等配套制度也还有很大完善空间。而在高校层面，国际化亟需形成全校共同承担的责任体系，人才培养、科研、人事、财务、学生工作等部门的职责亟待有效衔接，高校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支撑能力有待提高，质量保障与风险治理能力尚需提升。

五 行动倡议：推动更加开放、优质、互惠和可持续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

面对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全球人才竞争加剧、科技合作规则重塑和数字化转型加快，高等教育国际化仍然是各国共享知识、培养人才、促进创新和增进理解的重要途径。

未来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不能只依靠人员流动、项目数量和短期合作维系，更需要在开放合作、质量提升、公平参与、制度联通和风险治理之间形成更加稳健的平衡。为此，各国政府、国际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和相关社会主体应共同推动更加开放、优质、互惠和可持续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在此，提出四点行动倡议：

行动倡议一：共同维护开放、互信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空间

开放合作是教育和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各国应在尊重不同教育制度、发展阶段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维护人员流动、科研合作和学术对话的基本空间。对于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人工智能治理、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问题，应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和国际组织开展长期、稳定的跨国合作，推动知识、数据、人才和经验在互信的环境中流动。

在安全和合规要求上升的背景下，各方也应避免将正常教育交流和学术合作简单泛安全化。涉及敏感领域、数据流动、知识产权和科研安全的管理措施，应坚持风险导向、边界清晰、程序透明和比例适当的原则，为必要的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和科研合作提供稳定、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行动倡议二：
共同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内涵式、普惠化发展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价值不能只用学生规模、协议数量、项目数量和短期收益衡量，更应关注学习者的真实收获、教师的教学能力、合作伙伴的平等参与和合作成果的社会价值。各方应加强课程质量、学习支持、学生权益、学位授予、学分转换、资历认可和质量保障等方面的协调，为跨境学习、联合培养、在线学习和非学位学习提供更加透明、可靠的制度环境。

同时，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应更加重视公平和互惠。应通过奖学金、教师培训、数字资源共享、职业教育合作、区域能力建设和多边项目支持，扩大不同国家、地区和群体参与国际化的机会。对于全球南方国家和发展中地区，应更加重视教育能力建设、产业人才培养、数字教育资源共享和本土发展需求，避免国际化进一步扩大教育资源、知识生产和发展机会的不平衡。

行动倡议三：
共同加快跨境学习、科研合作和数字教育的联通

随着实体流动、混合学习、虚拟交流、微证书、联合课堂和跨国实践不断发展，传统以人员流动为中心的国际化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各方应推动学分体系、资历框架、质量保障和学习成果认证之间的衔接，提升跨境学习成果的可记录、可比较、可积累和可转移水平。区域性合作机制和多边教育平台应在课程共建、质量认证、职业资格衔接和学习成果互认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数字技术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了新的空间，也带来了新的治理要求。各国和高校应共同提升在线课程质量、虚拟交流设计、数字平台治理和学习支持能力，推动数字教育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开放共享。与此同时，应加强跨境数据治理、隐私保护、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算法责任和学术诚信等方面的规则协商，使数字化国际教育既扩大参与机会，也能够保障质量、权益和信任。

行动倡议四：
共同提升各类教育主体作用与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形态不断拓展，参与主体也更加多元。高校、职业院校、科研机构以及相关行业组织，在人才培养、科研合作、标准衔接、课程建设、数字教育和能力建设项目中承担着不同功能。教育国际合作的成效，越来越取决于这些主体是否具备稳定运行项目、整合多方资源、开展跨境协调和持续改进质量的组织能力。

因此，应支持不同类型教育主体根据自身定位参与国际合作。研究型大学可更多发挥科研合作、知识生产和全球议题参与优势，行业特色高校和职业院校可围绕产业需求、职业标准和技术技能培养拓展合作，地方高校机构也可结合区域开放、国际理解教育和人文交流形成特色。与此同时，应完善高等教育国际化专业服务、质量保障、数据监测和风险预警机制，推动更多教育资源、课程方案、标准体系和能力建设项目转化为可共享、可持续、可适配的教育国际公共产品。

面向未来，全球教育界需要在日益复杂、变动频发的环境中坚持开放合作的基本方向，以更高质量的教育交流促进人才成长，以更有组织的科研合作回应共同挑战，以更成熟的制度治理维护合作安全与信任。只有将开放合作、质量提升、公平参与、规则衔接和风险治理统筹起来，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才能在复杂变局中保持活力，并为各国教育发展和全球共同利益作出稳定持久的贡献。

（本报告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联合研制，仅用于行业参考，转载请注明出处，未经许可不得商用。）

参考文献

[1] 西蒙·马金森 , 张婧妍 , 赵琳 . 更趋多极化与冲突性世界中的高等教育国际化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6,47(1):1-12.

[2] 杨丹 . 以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服务教育强国建设 [J]. 神州学人 ,2026,(1):6-7.

[3] 秦惠民 , 王名扬 . “一带一路”十周年：我国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政策、成效与新格局 [J]. 中国高等教育 ,2023,(20):37-41.

[4] 陈凯华 , 赵彬彬 , 张超 . 全球科研人员百年跨国流动规律、格局与势差效应——基于 Scopus 科学文献数据的实证研究 [J]. 管理世界 ,2024,40(2):1-27+100+28-31.

[5] QS Quacquarelli Symonds. Three scenarios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2030: Global student flows[R]. London: QS UK Ltd, 2025: 7.

[6] 陈凯华 , 赵彬彬 , 张超 . 全球科研人员百年跨国流动规律、格局与势差效应——基于 Scopus 科学文献数据的实证研究 [J]. 管理世界 ,2024,40(2):1-27+100+28-31.

[7] 刘景华 , 凌鹊 . 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网络演化及多维邻近性机制 [J]. 复旦教育论坛 ,2025,23(1):92-100.

[8] 王小青 , 胡敏捷 , 戴坤 . 百年变局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结构变迁与演进逻辑 [J]. 中国高教研究 ,2026,(8):74-82.

[9] 吕睿鑫 , 高益民 . 基于教育“三维属性”的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的使命重构与路径优化 [J]. 中国电化教育 ,2026,(9):91-95.

[10] 刀慧娟 , 谭文斌 . 在“双向奔赴”中推进教育对外开放 [N]. 光明日报 ,2024-10-10(14).

[11] 孟韬 . 转型与融汇：中外合作办学“2.0 版”关键词 [J]. 神州学人 ,2025,(4):5-7.

[12] 张伟 , 刘宝存 . 在地国际化：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走向 [J]. 大学教育科学 ,2017,(3):10-17+120.

[13] Marginson S. National/Global Syner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ce in China since 1978[J]. 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 2018, 13(4): 486-512.

[14] 崔宇红 , 单怡 . 风险叠加背景下中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的演进趋势与研究转向 [J]. 复旦教育论坛 ,2026,24(2):118-128.

[15] 段世飞 , 刘林佳 , 钱跳跳 . 从“物理国际化”到“虚拟国际化”：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范式转换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4,45(3):48-59.

[16] 樊未晨 . 我国慕课数量和学习人数均居世界第一 [N]. 中国青年报 ,2024-12-16(5).

[17] QS Quacquarelli Symonds. 全球学生流动报告：中国 [R]. London: QS UK Ltd, 2025: 23.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关于构建国际数字教育标准体系框架的倡议》和《教育大模型总体参考框架》联盟标准 [EB/OL]. (2025-05-16) [2026-09-28].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2025/2025_zt06/cgfb/202505/t20250507_1189608.html.

[19] 刘骥 . 百年变局下全球教育治理的历史回望与远景擘画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4(2):113-121.

[20] 吴寒天 , 张晓超 . 从知识枢纽到全球治理枢纽：高等教育枢纽职能的整合与变革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6,(5):24-35.

[21] 中国社会科学网 . 面向全球治理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通往国际组织之路 : 全球胜任力与人才培养路径的创新与实践”会议综述 [EB/OL]. (2026-01-27) [2026-09-26]. https://www.cssn.cn/zkzg/lbt/202601/t20260127_5970936.shtml.

[22] 江丰光 , 陈润枝 . 全球视野下的 STEM 教育国际化进程与中国路径 [J]. 中国电化教育 ,2026,(1):69-74+83.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CHINA EDUCATIO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